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与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

——经济新常态的视角

邵 慰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与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

——经济新常态的视角

邵 慰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与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经济新常态的
视角/邵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

ISBN 978 - 7 - 5161 - 7671 - 9

I. ①创… II. ①邵… III. ①制造业—技术革新—研究—
中国 ②制造业—转型经济—研究—中国 ③制造业—产业
结构升级—研究—中国 IV. ①F42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766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特约编辑 林 木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209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0CJY033）

浙江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研究基地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特色重点学科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民族复兴的“大国重器”	1
第二节 经济发展的“旧常态”和“新常态”	8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	19
第四节 本书分析视角、方法和框架	29
第二章 旧常态下的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	41
第一节 数据及相关讨论	41
第二节 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43
第三节 分行业竞争力因子分析	44
第四节 面板数据计量分析	49
第五节 计量结果及讨论	51
第三章 新常态下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趋势	53
第一节 经济新常态带来的双重影响	54
第二节 新常态下装备制造业的SWOT分析	61
第三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基本发展趋势判断	72
第四节 新常态下装备制造业的机遇和挑战	73
第四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I：协同发展	75
第一节 装备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关系	76
第二节 装备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困境	78
第三节 装备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协同发展策略	81

第五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Ⅱ：技术跃升	83
第一节 装备制造业技术跃迁的传统路径	83
第二节 装备制造业技术跃升的海外并购路径	86
第三节 装备制造业技术跃升的自主创新路径	94
案例：黄海汽车的自主创新策略	107
第六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Ⅲ：人才培养	111
第一节 加强国内人才培养	111
第二节 加快引进海外研发团队	116
第三节 加快引进外专千人计划	118
案例：巴顿、越费与苏联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119
案例：越费与苏联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131
第七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Ⅳ：制度创新	142
第一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分析	144
第二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制度创新机制	150
第三节 加快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制度设计的原则	156
第四节 优化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制度环境	159
案例：华晨汽车制度创新的案例	160
第八章 结束语	164
第一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制度“瓶颈”	165
第二节 对策与建议	167
附 表	172
附录：调查问卷	177
参考文献	179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民族复兴的“大国重器”

工业是国之基础，装备制造可谓国之脊梁。装备制造业是大国之重器，只有工业装备强，才有国家真正的强盛。研发、设计、制造出装备制造领域的“大国重器”，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坚实的基础，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牢靠的载体。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各类技术装备的各制造业的总称。根据我国的统计分类，装备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七大类。装备制造业是基础性、战略性产业，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然而，经济学理论一直饱受不能清晰阐明其假设之苦。经济学家在构建理论时，经常忽略考察其建立的基础。而这种考察有时是不可或缺的，不仅为防止因缺乏理论依据的假设而产生的误解和无谓争论，还因为经济学在选择相互竞争的各组假设时做出良好判断极其重要。^① 在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研究中，学者们忽略了制度安排对于经济绩效的重要影响，或者干脆将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设定为制度是无摩擦的，在论述与制度有关的问题时直接一笔带过，习惯性地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将企业描述成一个“黑箱”。因此，无论他们在论证的过程中怎么努力，所研

^① [美] 奥利弗·E. 威廉姆森、西德尼·G. 温特：《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姚海鑫、邢源源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3—40页。

究出的结果对现实的解释力总是苍白无力的。在中国装备制造业中,国有企业占很大比重,所以,政府在企业决策中影响力非常大。作为重要决策部门的政府,很多计划或决策都是建立在忽略支配交换过程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可以想象出这样的决策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短期而言,降低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长期而言,将使中国这一最重要的产业彻底退出竞争行列。

国家非常重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近年来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利好装备制造业振兴的文件和政策:2006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8号)。2008年,世界范围内全面爆发了金融危机,国家在2009年2月紧急颁布了《装备制造业产业振兴规划》。同时,我国目前正处于扩大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市场对先进装备有着巨大需求;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产业格局的调整,为我国提供了参与产业再分工的机遇,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抓住机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强技术创新,促进装备制造业持续稳定发展。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之后,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流的国家队是我国制造业。因此,重新审视我们研究的前提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 制度约束已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人类的相互交往,包括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交往,都依赖某种信任。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我们称这些规则为“制度”。制度既是社会长期磨合的结果,也是人们有意识创立的规则,它能够有效抑制人们可能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并由此成为一种引导人们行动的手段。因此制度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① 诺斯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包括“正规约束”(例如规章和法律)和“非正规约束”(例如习惯、行为准则、伦理规范),以及这些约束的“实施特性”。^②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同时对

① 李怀、邵慰:《高校科研人员激励制度的层级理论分析》,《中国科技论坛》2009年第7期。

② [德]柯武钢、史漫飞:《制度经济学》,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5页。

经济绩效产生巨大影响。但人们提到激励制度时,往往更多地注意正式制度对激励的作用,而易忽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在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约束中,既有某些社会成员有组织的社会行为,如产权结构、企业代理问题与激励设计、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等;也有以习惯、习俗和内在规则等形式出现的非正式制度,如企业文化、社会认识等。以产权结构为例,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以国有企业为绝大部分,虽然近几年民营企业得到了一些发展,但是国有企业的比重仍然非常大。装备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性,使得国有企业的存在成为一种必然。在那些事关国家经济命脉以及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的领域,必须要保证国家对产业的控制权,为国有企业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存在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由。然而,国有所有权垄断会降低行业竞争,造成产业的低效率,给社会的福利带来较大的损失,在这样的一种困境中,如何振兴装备制造业,成了难题。引入非国有所有制以及外资,会担心国有控制权流失问题;不引入多元的所有权形式,又会产生低效率问题。那么,如何权衡国有所有权、非国有所有权(民营及外资)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而且实际了。^①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取决于类似产权制度这类正式制度的合理设计。另外,国有企业的人员冗余和不断膨胀永远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企业中吃大锅饭的思想和行为仍然非常普遍。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因为在观念上仍然难以为大多数工人接受而成为理想中的状态。同时,国有企业的代理人没有转变观念,对国有企业政策、融资、土地等方面的呵护,让民营企业的成长更加困难。类似的问题,如果不能落实到制度层面,那么再多的口号式的号召都不会在市场上形成主流。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许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瓶颈”。制度是重要的,因为它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不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其真实性也为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将这些存在的制度障碍加以解决不仅会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问题,也是我国强盛之本。

二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困境

长期以来,和其他中国制造业一样,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于成本低,而不在于技术领先。其产品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销,都依赖于较低的价位和较好的技术。因为我们的尖端技术需要引进,目前美国等西方发

① 安玉兴等:《产权制度改革与振兴装备制造业》,《中国科技论坛》2007年第6期。

达国家仍然对我国高科技的出口实行禁令，所以我们没有能够引进到最一流的技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市场换技术”战略，希望通过让渡一些国内市场吸引外资以换取或学习先进技术，进而提升本土企业技术水平。然而，“市场换技术”战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以重大技术装备为代表的典型产业依然高度依赖进口，跨国公司投资的合资或独资企业在整个产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垄断势力业已形成。部分产品虽然实现了国内生产制造，但缺乏自主设计能力，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方手中。^① 进入 2008 年下半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使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急速下滑。新接订单量大幅缩水，长期发展压力很大。深层次的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海外需求萎缩，我们价格优势不再是竞争的法宝；二是我们的技术不能在行业领先，舶来的技术未能消化再创新而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传统的制度概念一直被看作是政治学的“专利”，直到制度本身所包含的效率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时，这一概念才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同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制度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完善以及不断面临被替代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作“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制度进化和制度变革。制度进化是指一项制度通过自身的修正和改良逐步走向优化的过程。^②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所以，作为正式制度的供给方政府审时度势设计了一些制度。为了解决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困境，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总体形势下开展海外并购工作，以有利于我国企业通过合法手段引进先进的专利技术，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优势，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占领国外市场，同时也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然而，这样的制度供给并不能满足需求方对制度的需求，这样的结论也被结果所验证。并且因为该制度的变迁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不是由原有制度演进的，同时该制度将行政手段的推进代替市场的作用，带来的后果就是为了完成行政目标而夸大被引进方科研能力。花了大价钱，引进之后却不能形成经济效益的有效增

① 孙晓华、原毅军：《业主风险厌恶、自主创新的市场失灵与第三方介入——以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为例》，《研究与发展管理》2008 年第 12 期。

② 李怀：《制度生命周期与制度效率递减——一个从制度经济学文献中读出来的故事》，《管理世界》1999 年第 3 期。

长。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如果市场上企业会通过这样的行为获利,那么这样的目标就会通过市场作用自发实现,而无须行政资源的参与。在正式制度领域,类似于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政府官员为了政绩实现经济绩效大幅提高和经济增长,但是付出的努力与辛苦设计的制度却不被市场所接受。

在非正式制度领域同样存在着困境。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注定是缓慢的、渐进的。以企业文化、习惯、风俗等形式出现的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绩效的重要影响是无须争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变迁过程主要存在三种现象:时滞效应、路径依赖效应和连锁效应。^①这三种现象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方面的表现就更加明显。在企业管理模式中,我国的一些装备制造业企业尝试过引进包括 JIM 的丰田管理模式,也尝试过引进美国的六西格玛管理模式,或者德国的一些管理模式,但是,同样的管理模式,在其他国家有效,在我们的企业就没有效果或者推进不下去。同时,任何目标公司对于“嫁给”其他文化的陌生人都是存在疑虑的。对于处在目前阶段的我国公司来说,这些挑战可能会超过他们的管理能力、文化理解和资源。除非引入外部顾问或快速做出重大的调整,这些挑战将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失。

三 装备制造业发展凸显出竞争力不足问题

徐建平、夏国平通过对成本和效益、生产能力和产品技术水平、技术引进水平和研发投入、先进制造技术开发和应用能力、集成能力和产业集中度、市场占有率、人才和政策等方面的国际比较,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国装备制造业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和发展对策。尽管近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可靠性有所提升,但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产品质量在稳定性、可靠性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竞争力还不够强。^②陈爱贞、刘志彪在分析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演变基础上,借助投入产出分析发现,我国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中间投入层次比较低,虽然其中间投入结构中直接消耗资源和能源不多,但间接消耗资源和能源比较多,且依赖性有上升趋势;虽然其垂直分工程度呈上升趋势,但外泄效应比较显著,阻碍了国内价值链的延伸。这些影响我国装备制造业

^① 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8 页。

^② 徐建平、夏国平:《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国际比较及对策研究》,《中国机械工程》2008 年第 10 期。

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因素又由其地位所决定。恶性循环带来的生产模式“自我锁定”，造成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效应。以外资为主力的“为出口而进口”的贸易模式增强了这种锁定效应。为突破这种“内生”及“链条关联”的影响，需要进行价值链创新。^① 原毅军、耿殿贺在分析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研发效率影响因素基础上，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装备制造业的研发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产业结构、政府政策和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结构是影响装备制造业研发效率的主要因素。^② 李凯、李世杰在综述国内外研究人员对产业集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起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结构框架，并试图研究产业网络层和社会网络层的链接模式，以探究装备制造业集群要素结网、链接的深层次原因和装备制造产业集聚的特点^③，并借鉴系统耦合的思想，把装备制造业集群要素间的经济联系和内在产业关联抽象为制造企业耦合、集群产业耦合以及区域社会网络耦合三层结构，构建装备制造业集群耦合结构；结合集群耦合度模型，研究装备制造业集群的耦合机理和影响集群要素耦合度的因素。^④ 李怀（2000）认为，资源的枯竭导致东北地区以初级资源开发为主的第一产业的衰退；技术落后和创新的不足导致东北地区以机电行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萎缩；传统制度本身的低效率在一定程度遏制了产业的进化，拉大了东北地区与外部的产业生命周期差距。^⑤ 一些学者将中国装备制造业与德国、日本等装备制造业相比较，得出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远远落后的结论。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不足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共识，而装备制造业又在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提高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研究就成了很重要的课题。

四 实践的偏差引出理论的困惑

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的生产函数模型为： $Y(t) = F(K(t), A(t)L(t))$ ，其中 t 表示时间。产出由资本 K 和有效劳动 AL 决定。那么根据索洛的经

① 陈爱贞、刘志彪：《决定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因素——基于各细分行业投入产出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4期。

② 原毅军、耿殿贺：《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研发效率的实证研究》，《科技与经济》2010年第3期。

③ 李凯、李世杰：《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结构研究与实证》，《管理世界》2004年第12期。

④ 李凯、李世杰：《装备制造业集群耦合结构：一个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2期。

⑤ 李怀：《“东北现象”：问题的实质与根源》，《管理世界》2000年第4期。

济增长模型来判断,从2008年至2014年年底,中国装备制造业投入了大量资金,累积了大量的技术工人,也具有技术工人培养和培训的优良传统和教育资源条件,这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①中国自“一五”期间就效仿苏联实行优先发展装备制造业的政策。金融危机以后更是加大了投入的力度,那么为什么在得到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拥有良好的技术工人的情况下,其竞争力却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学术界多年以来围绕着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问题也进行过很多研究,提出了很多提升竞争力的策略。面对现实的巨大反差,引出理论研究的巨大困惑。是不是以往的研究还是存在着某种不足?因此亟须对原有理论进行补充以解释现实和指导现实。

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和产业振兴的研究中,创新是一个提及频率最高的词。经济学上,创新概念的起源为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熊彼特在其著作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引入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等。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范围很广,如涉及技术性变化的创新及非技术性变化的组织创新。毫无疑问,创新会给产品带来持久竞争力。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疑问就产生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倡导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没有取得理论中应该达到的效果?原因是什么?

李怀等认为,制度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动力之源。^②制约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因素已经不再是资本或者是劳动力,而是制度。在落后的情况下,寻找后发优势的实现方法也必须依赖创新。制度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动力之源。制度后发优势实现的核心问题,是正式制度模仿、非正式制度模仿及其关系问题。正式制度是可移植的,但又受到宪法程序、关联制度、非正式制度等的内在制约。同时,非正式制度内在于传统和历史沉淀,其可模仿性就差得多,但在开放条件下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不可能封闭进行。制度模仿的过程,是新的正式制度与本土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与融

^① 任净、车贵堂:《提升辽宁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思考》,《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10页。

^② 李怀、吴练达:《制度、自由与创新的内在机理——基于经济学的视角》,《财经问题研究》2007年第12期。

合的过程,是引进制度的本土化过程。^①提高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不仅要进行产品创新,更重要的是对制度进行创新。

第二节 经济发展的“旧常态”和“新常态”

2014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新常态。12月9—1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明确表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的讨论,从金融危机时就已经开始了。金融危机后,人们从多种视角对危机的性质与原因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第一种视角,从金融制度和监管缺陷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何德旭等,2009)。这种解释在危机发生初期影响最盛。但这种把危机归结为金融制度和监管缺陷的解释,多少带有外生性解释的味道。金融制度和监管缺陷是原因,但肯定不是单方面发生作用的。需要弄清楚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金融制度和监管缺陷存在并进而引发金融危机的^②。换言之,为什么这样的制度和监管缺陷没有被事先发现?是忽略了因而没有被发现,还是本身就不容易克服?不然,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危机发生在现在,而不是发生在过去或者将来?

第二种视角,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角度进行分析和阐述。而国际收支失衡,又被认为是结构失衡的集中体现。经过历史的比较分析认为,当今的失衡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失衡总量也大,而历史上高逆差是很难持续的,一国经历一段时期逆差之后都要经历经常账户的调整,调整期间一般伴有本币贬值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现象。早期是英国,现在是美国。这使美国经济必然进入调整期,金融危机于是相伴发生。^{③④⑤}

但是,国际收支失衡与国家之间相对发展水平的变化并没有都导致金融危机,所以仍然需要从大历史视角,从政治经济的特定历史背景来分析

① 郭熙保、胡汉昌:《论制度后发优势的实现机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② 何德旭、郑联盛:《金融危机:演进、冲击与政府应对》,《世界经济》2009年第9期。

③ 刘钻石:《世界经济失衡的今昔对比研究》,《世界经济情况》2008年第2期。

④ 张明:《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演进及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

⑤ 王道平、范小云:《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是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的原因》,《世界经济》2011年第1期。

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况且,因为多年以来美国一直保持很高的海外净利润,美元又是主要储备货币,其国际收支逆差被高估了。

第三种视角,从世界经济的长周期来观察金融危机。认为上一个长周期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革命,2001年随着新经济泡沫破灭而动力衰竭。2005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靠次贷和全球化红利,超发货币,过度发展金融,引发全球流动性泛滥和资产高度泡沫化,最终,在2008年以大危机而宣告终结。^{①②}

这个分析解释了金融危机发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与原因。但是,逻辑上经济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一个变量被固定下来,其他变量会围绕它做调整;经济的名义变量可以被固定,实际变量却一定会自动调整,实际变量会趋于呈现其本来的面目。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是什么制度制约了经济向均衡做调整?造成结构失衡而不易自我调整的微观制度是什么?

分析金融危机性质与原因的视角不同,决定了对于世界经济前景的看法也会有异。201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呈现出“经济增长”、“债务危机”、“通货膨胀”、“财政整顿”四大特征。但为什么会呈现这样四个特征?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微观制度原因在哪里?制约结构调整的微观制度障碍又在哪里?对装备制造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又有哪些影响?从中探寻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微观制度原因与结构调整的微观制度障碍,揭示危机后世界经济呈现困局的根源,并对世界经济的前景和中国的应对措施给出分析。

一 旧常态下装备制造业不可持续高增长

分析特定时期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高增长,有五个大事件不可忽略。^③第一个大事件是IT革命;第二个大事件是柏林墙倒塌,众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轨市场经济;第三个大事件是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普遍推行;第四个大事件是凯恩斯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盛行;第五个大事件是以美元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信息技术革命使得供给端更加有效率,而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

① 谢作诗、李善杰:《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原因及含义——兼论经济的增长性质及金融危机之下的增长前景》,《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

② 田伯平:《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经济新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6期。

③ 谢作诗、邵慰:《局限转变、结构调整与中国增长前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年第7期。

家转轨市场经济则使得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商品价格，使得美国扩张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通货膨胀美国可以继续扩张货币，因此有了长达十几年的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不仅仅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日本最为典型，差不多整个二十年都实行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然而经济并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表现出通货紧缩，以致货币理论大师弗里德曼对于自己的货币数量论都产生了怀疑。

在长期的低利率扩张货币政策下，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加之美国政府为了“居者有其房”，让“房地美”、“房利美”部分承担了消费者的购房风险所产生的推动，致使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①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泡沫膨胀）过程中，美国人民以房地产做抵押获得大量流动性以支持超过其真实收入可以维系的消费水平，高消费、低储蓄的美国生活方式于是产生并得以维持。^②人们甚至怀着一种骄傲和羡慕心理把美国人民的这样一种借钱消费、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称作美国文化。又由于有了以美元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撑，美国这样一种负债生活方式于是得以持久维持。^③

不只是资产市场存在累进叠加形成资产泡沫的机制，实体经济同样会产生累进叠加的后果。依据包括资产泡沫所产生的虚假收入在内的总收入来消费，这本身会导致短期的经济繁荣，现在的繁荣又提升未来收入预期，进一步增加消费，这就形成了一个累进叠加效果。资产市场、实体经济市场以及两个市场之间如此累进叠加结果必然是经济的短期巨大

① 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馈循环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推高了的房地产价值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

② 理论上，任何家庭和个人都不可以长期负债高消费。美国家庭和个人的高消费，应该由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来得到解释。理论不允许有例外，任何家庭和个人的消费都是依赖于其收入的。只不过，美国家庭和个人依据的是包含了资产泡沫所产生的虚假收入在内的总收入来安排消费。不考虑资产泡沫所产生的虚假收入，美国家庭和个人就表现出高消费、低储蓄，甚至是负债高消费。但实际上，考虑了包含资产泡沫所产生的虚假收入在内的总收入，美国家庭和个人的高消费、低储蓄就可以得到解释。当然，经济的制度安排不一样，发展水平不一样，消费倾向可以不一样，因此高与低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无论如何，长期的负债高消费除非用系统性的收入幻觉来得到解释，否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成立的。

③ 其实，美元的国际中心储备货币地位决定了美国必然是一个负债国家。

繁荣。^①

问题的另一面是，从世界范围来看，高消费、低储蓄的美国生活方式要得以维持，必须有低消费、高储蓄的其他经济体来与之相匹配才有可能。作为世界经济的封闭整体，经济均衡增长必须（世界整体的）总供给等于（世界整体的）总需求。而中国经济，由于人口红利，以及由于体制性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产生的低消费、高储蓄，恰好成为美国经济的匹配体。正是因为中美两个国家一阴一阳，成就了世界经济的均衡高增长。也促进了对装备制造业的旺盛需求。

其实，没有通胀仅仅是过度发行货币的有利条件，超发货币背后的激励机制则在于当今世界的政治体制。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不是终身制。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政治家们考虑短期一定胜于长期。能够超发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任何人都会超发。更一般地看，超发货币和赤字财政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今天，欧洲闹出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财政赤字也成大问题，原因都在于当今的政治制度。民主、非终身制有一万个好处，但也有一个坏处，就是领导人会讨好选民，派发免费午餐。^② 今天西方世界福利主义盛行，财政赤字高得令人咂舌，就是民主的代价。民主、非终身制不仅深深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过去，还将持续影响世界经济的未来。民主、非终身制在西方世界普遍、持久的推行，这对于世界经济是一个重大约束。

无疑，整个西方世界出现寅吃卯粮的状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凯恩斯主义世界范围盛行，为各国执政者所偏爱，这是需要加以重视的又一重大约束。

货币扩张，当然会带来短期的高增长；赤字财政、福利主义，把未来的钱叠加到现在花，当然会产生短期的繁荣。正是这些因素的累积作用，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增长。问题是这个趋势能够持续吗？过去的短期政策，是不是到了长期必须要支付代价的时候了？

今天，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剩余劳动已接近用完，以不变价格获得无限劳动供给已无可能；短期里也看不到能够替代 IT 革命的技术革命。今天，

① 叫短期，时间其实可以不短。

② 民主带来好的结果是有条件的：一是产权要得到清晰的界定和保护，什么事情应该投票，什么事情不应该投票，又该以怎样的程序来组织投票，事先都要有清楚的界定；二是中产阶级要成为社会的大多数。